·调查与思考·

东北地区城市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研究*

——来自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市的调查

尹海洁　王翌佳

【摘　要】文章定量分析了东北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发现该群体的就业质量处于整体性低下的状态，并存在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社会保险缺失、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岗位固化等特点。通径模型的结果显示，个体因素是影响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原生家庭因素影响十分微弱。文章认为，有关部门在关注就业率的同时，也应注意提升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规范劳动合同制度，健全该群体的社会保险，提高群体成员的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工作贫困　就业质量　因子分析　通径分析

【作　者】尹海洁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翌佳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中，贫困往往被解读成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结果。换言之，若个体有工作则不会陷入贫困。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欧美国家逐渐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一些劳动者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芦恒，2012）。在他们身上，贫困和就业的关系似乎已从传统的对立变为共生，学者们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工作贫困”。目前，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工作贫困定义为：成人每年至少工作 27 周，但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BLS，2014）。加拿大国家福利委员会的定义为：在没有 65 岁及以上成员的家庭中，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工作或自雇收入，但家庭收入低于官方最低收入标准（NCW，1978）。德国政府则认为，工作贫困是个体处于全职工作状态，但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的 50%（周娟，2009）。虽然世界范围内对工作贫困尚无统一定义，但国外学术界已针对这一现象进行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城市社会的新底层阶级研究”（编号：10YJA840050）的阶段性成果。

了很多实证研究。Joassart-Marcelli(2005)分析了南加州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的构成,并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拉丁裔,从事服务或体力劳动职业,未加入工会,文化程度较低,家庭中子女数量较多但劳动力较少。Wicks-Lim(2012)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对全美工作贫困者的就业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低、职业对应的社会阶层低成为该群体就业的突出特点。Fields(2012)则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介绍了亚洲和美洲地区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下的工作贫困者面临的各种压力,如过度劳动、低收入、收支不平衡等,并将他们的生活概括为"在工作中贫穷"。与国外相比,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对工作贫困问题进行过探讨。周娟(2009)比较分析了英、美、法、德四国工作贫困研究的进展,认为积极发展该领域研究对完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有重要意义;芦恒(2012)分析了韩国青年工作贫困者的生存现状,并总结其具有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等特点;姚建平(2009、2011)则通过对官方数据的分析,证明中国城镇和城市工作贫困群体的存在,并指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是工作贫困者的主体,他们多就职于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非正规部门中。

以上研究虽然详细论述了国内外工作贫困群体的构成、就业情况和贫困状态,但缺乏对该群体就业质量的全面探讨,而仅将"就业"作为描述其贫困状态的指标之一。我们认为,由于"就业"是工作贫困群体与传统的无业贫困群体间的最大区别,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出发更能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特点和问题。东北地区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是计划经济体制确立最早,退出最晚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工作贫困群体在就业质量方面存在很多特点。因此,本文试图对东北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个体因素和原生家庭因素对该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实施

(一)就业质量的测量

本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从劳动保障、收入、劳动时间、岗位发展和工作环境 5 个维度入手,对工作贫困者的就业质量进行测量,并在每个维度下设计具体指标(见图 1)。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通径模型分析个体因素和原生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调查对象的学历、年龄和工作更换次数,原生家庭因素包括调查对象父辈学历[①]和原生家庭收入。本文假设个体因素和原生家庭因素均会对调查对象的就业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设就业质量为 y,学历为 x_1,年龄为 x_2,工作更换次数为 x_3,父辈学历为 x_4,原生家庭收入为 x_5,P_{yj} 为 x_i 和 y 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则所有直接影响的通径方程为:

$$y=P_{y1}x_1+P_{y2}x_2+P_{y3}x_3+P_{y4}x_4+P_{y5}x_5 \quad (1)$$

① 在本文中,父辈学历指父母双方中文化水平较高一方的学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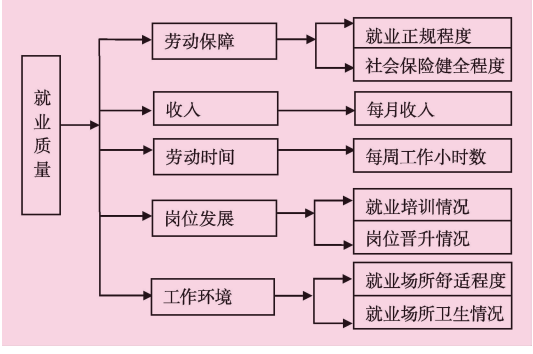

图 1　就业质量测量指标

除直接影响外，变量间的间接作用也会影响因变量。首先，根据 Diamond 等（2004）的研究，父辈学历和原生家庭收入均会通过调查对象的学历间接影响其就业质量。本文在探索性研究中还发现，调查对象的年龄与学历呈负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父辈学历、原生家庭收入和年龄对调查对象学历的作用可以表示为：

$$x_1 = P_{14}x_4 + P_{15}x_5 + P_{12}x_2 \qquad (2)$$

有研究显示，学历越高的劳动者，其就业稳定性越高，这意味着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工作更换次数相对更少（孟凡强、吴江，2013），且劳动者的年龄与工作更换次数呈负相关（张再生、赵丽华，2011）。因此，学历和年龄对工作更换次数的作用可以表示为：

$$x_3 = P_{31}x_1 + P_{32}x_2 \qquad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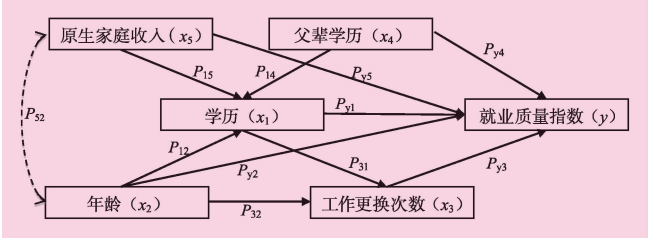

图 2　影响因素作用的初始模型

注：图中实线单箭头表示因果关系，虚线双箭头表示相关关系。

探索性研究还发现，调查对象的年龄与其原生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相关关系，随着调查对象年龄的增长，其父母的工作能力进一步下降，原生家庭收入也逐渐降低。考虑到模型的完整性，该组相关关系也被包含进模型中，但并不参与后期的分析。本文建构的初始通径模型如图 2 所示。

（三）操作化定义和调查实施

由于中国学术界尚无工作贫困的操作化定义，不利于样本的选取。本文参考了 Bardone 等（2005）关于工作贫困研究的成果，采用国际贫困线标准（简称 IPLS）作为判断工作贫困的依据。国际贫困线标准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2012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 26 959.0 元①，则相应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 13 479.5 元，年收入低于该标准的劳动者即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由此得到工作贫困的操作化定义为：调查对象依靠劳动获得收入，但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13 479.5 元，该家庭为工作贫困家庭，该调查对象为工作贫困者。

本文以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为调查地，先通过判断抽样选取了工作贫困者相对集中的职业，并将这些职业比较集中的地段作为调查地点。在哈尔滨以哈西服装城、综合市场周边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区域为主;在长春以西朝阳路农贸市场附近区域、高新区某盐制品厂和纸箱厂及周边区域为主;在沈阳以东湖市场附近为主。调查采用巧合抽样为主,“滚雪球”抽样为辅的方式进行,并采用结构式访谈记录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就业情况。调查于 2013 年 7～8 月在长春市和沈阳市进行,2014 年 7～8 月在哈尔滨市进行。共发放问卷1 256 份,回收 1 051 份,筛选出有效问卷 1 000 份。

(四)样本的分布特征

调查对象中 51.5%为男性;年龄在 20～30 岁(44.3%)和40～50 岁(20.6%)的比例较高。在 20～30 岁的调查对象中,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占 50.3%,私营企业员工占较大比例(40.9%),具体工作以销售人员(16.7%)、生产或技术加工人员(15.1%)和普通职员或文员(14.2%)为主。在 40～50 岁的调查对象中,73.3%的人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临时工(44.2%)和散工(16.5%)占较大比例,53.4%的调查对象至少更换过两次工作。从调查对象的原生家庭情况看,其父辈学历以小学(49.1%)和初中(32.6%)为主;其原生家庭收入集中在 500 元以下(22.8%)和 1 500～2 000 元(26.2%)。该结果说明,调查对象父辈的文化程度较低,且原生家庭多为贫困家庭或生活困难家庭。

三、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基本特征

(一)就业形式以非正规岗位为主,社会保险缺失严重

近年来,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指导下,东北三省的产业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非正规岗位也随之大量出现,非正规就业者比例增加。根据黄苏萍等(2009)的研究,截至 2006 年,东北地区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 37.34%,而本调查样本中,这一数字为 65.1%,可见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形式以非正规为主。在中国,非正规就业和社会保险缺失联系紧密,因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仍是正规就业人员(华迎放,2009)。本文列出了社会保险的基本项目,要求调查对象选出自己参保的项目。结果显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个基本社会保险的普及程度均较低,没有五险一金的调查对象占 57.9%(见表 1)。由于被社会福利体系排斥在外,很多调查对象在访谈期间都流露出对医疗和养老问题的不满。但他们也表示,由于缴纳过程复杂、金额过高、持续年限过长等原因,他们不会主动缴纳社会保险。这一现象反映出工作贫困群体社会保险的缺失不仅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问题,也与东北地区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缺陷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以上结果说明,就业正规程度低,社会保险严重缺失成为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一大特征。

表 1　社会保险健全程度多重响应统计

社会保险	选择该项的人数	百分比
养老保险	341	34.1
医疗保险	402	40.2
工伤保险	172	17.2
失业保险	195	19.5
生育保险	118	11.8
住房公积金	74	7.4
没有五险一金	579	57.9

(二)劳动时间长但收入低

对于工作贫困群体而言,提高生活水平无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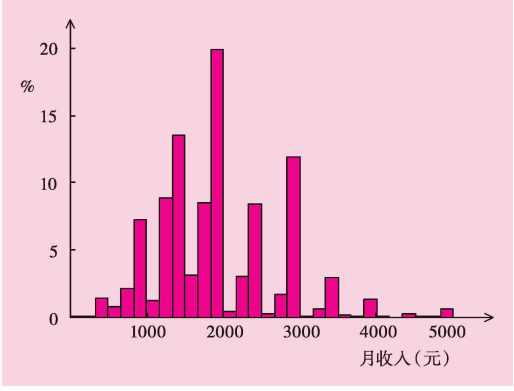

图 3　调查对象月收入直方图

他们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因此工作贫困群体的努力程度和脱贫能力成为本文关注重点。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每周工作56.5 小时，按照 1 周工作 7 天计算，他们每天要工作约 8.1 小时，可见其劳动时间超长。但是，调查对象的平均月收入仅为 1 988.0 元，55.3%的人集中在 1 000～2 000 元（见图 3）。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13 年东北地区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0 448 元[①]，每月约 3 370.7 元，样本中收入处于该水平以上的人仅占总数的 6.0%，可见超长的劳动时间并没有增加工作贫困群体的收入，他们的脱贫能力低下，很难通过就业来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与中国其他地区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相比，东北地区的整体水平列倒数第二位，仅高于中部地区（38 802 元[②]）。即便如此，东北地区的工作贫困群体中仍有九成以上的人难以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可以认为，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但与整个东北地区的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他们即使努力工作，也仍然被现有的分配机制逐渐边缘化，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但岗位上升机会缺乏

本文关注了调查对象就业场所的舒适程度和卫生情况。调查对象被要求针对这两方面情况进行评分，1 分为最低，5 分为最高。综合其打分情况发现，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 3.3 分和 3.4 分，可见调查对象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然而，在被调查者中，仅有 28.0%的人接受过岗位培训，结合调查期间调查员的观察结果可知，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调查对象的工作内容为简单重复性劳动，技术含量较低，没有岗位规范和技术升级等需求，因而不需要培训。同时，90.6%的调查对象反映其所在岗位根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他们很难通过晋升等常规方式实现向上流动。该结果显示，工作贫困群体普遍缺少上升机会，岗位固化现象已经出现。

岗位固化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只强调个体岗位的凝滞化状态。但是，工作贫穷群体已很难通过收入实现脱贫，如果上升途径不畅，其生活质量会长期停滞在较低层次。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东北地区最高与最低户收入比值呈逐年上升趋势（郭思齐，2012），说明区域内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而工作贫困群体由于岗位固化，其相对贫困程度与日俱增。这有可能导致他们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沉淀至社会底层，转化为传统贫困群体的一员。

（四）基于因子分析的就业质量综合评定

5 个维度的测量结果显示，除工作环境外，工作贫困群体在就业质量的其他维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弱势。为了进一步明确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情况，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

①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27_558611.html）。

建就业质量指数(简称 JQI),通过该指数对整个样本的就业质量进行综合测评,也便于后续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建构指数之前,本文先通过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来判断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43,Bartlett 卡方值为 5 897.1,显著性水平为 0.000,说明变量间相关度较高,数据适合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提取 4 个因子,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67.2%(见表 2)。

表 3 为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各因子在变量上的负载情况,这为因子命名提供了依据。由于因子 F_1 在就业正规程度和社会保险方面负载最大,因子 F_2 在就业场所环境方面负载最大,因子 F_3 在就业培训和岗位晋升方面负载最大,因子 F_4 在月收入方面负载最大,因此,这 4 个因子分别被命名为劳动保障因子(F_1)、工作环境因子(F_2)、职业发展因子(F_3)和收入因子(F_4)。

本文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将 4 个因子得分的加权值进行线性组合生成就业质量指数(JQI = $0.38072F_1 + 0.12643F_2 + 0.08428F_3 + 0.08026F_4$)。通过这一方式,不同测量水平、不同单位的指标被综合成一个因子指数,其数值大小反映调查对象就业质量的高低情况。

图 4 展示了调查对象就业质量指数的具体分布,其标准差为 0.418,"0"点表示样本平均值所在位置。从图 4 可以看出,大部分数据分布在约 4 个标准差内,说明调查对象的就业质量指数分布相对集中,内部分化较小。同时,整个数据呈右偏态分布,69.1%的调查对象就业质量指数分布在平均值以下,说明在样本内部,就业质量较好的人数很少,大部分调查对象的就业质量较差,甚至低于整个样本的平均水平。以上分析表明,工作贫困群体虽然

表 2　因子对方差变化的解释情况

因子编号	特征根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1	4.951	38.072	38.072
2	1.664	12.643	50.715
3	1.096	8.428	59.143
4	1.043	8.026	67.169

表 3　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矩阵表

因　子	F_1	F_2	F_3	F_4
就业正规程度	0.654	0.367	0.120	−0.115
养老保险健全程度	0.781	0.262	−0.068	−0.209
医疗保险健全程度	0.760	0.270	−0.074	−0.252
工伤保险健全程度	0.836	0.048	0.099	0.198
失业保险健全程度	0.867	0.096	0.088	0.087
生育保险健全程度	0.824	−0.041	0.095	0.265
住房公积金健全程度	0.667	−0.065	0.182	0.350
每月收入	0.170	0.212	−0.051	0.788
每周工作小时数	−0.393	−0.265	−0.147	0.356
就业培训情况	0.161	0.285	0.573	0.016
岗位晋升情况	−0.002	−0.004	0.861	−0.075
就业场所舒适程度	0.139	0.856	0.115	0.083
就业场所卫生情况	0.092	0.869	0.105	0.068

注:这里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方法旋转。旋转在 11 次迭代后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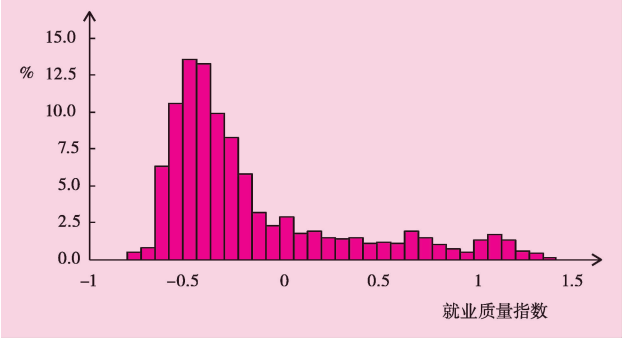

图 4　就业质量指数直方图

处于就业状态，但就业质量普遍低下，这是他们工作贫困的主要原因。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就业质量指数小于 0 的调查对象从事的职业，发现个体零售（20.2%）、销售（12.7%）、保安或保洁（12.7%）、散工（12.0%）和体力或运输工人（10.4%）等职业占较大比例，这些均属于东北地区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职业。目前，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虽然迅速兴起，但产业内部结构发育不良。比较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中，金融、软件、房地产等现代行业所占比例较高，而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中，餐饮、批发、零售、运输等传统行业所占比例较高（黄继忠、朱岩，2012）。这些行业以私营经济为主，存在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易出现非正规就业、收入低、发展空间小、就业稳定性差等问题。而且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不但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和社会资本也不丰富，他们很容易由于就业质量低下而陷入工作贫困。因此，东北地区的工作贫困现象也是区域内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种折射。

本研究样本中就业质量指数的分布情况还反映出，虽然工作贫困者的就业质量普遍低下，但内部也存在比较低下和非常低下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是行业特征和岗位特征的反映，也与其个人和家庭情况相关。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了解个体和家庭因素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

四、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拟合与检验

本文根据图 2 所示模型利用 Amos17.0 软件进行拟合。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本研究首先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个案，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数为 565 个。结果显示，通径 P_{15}、P_{y4} 和 P_{y3} 的显著性水平未通过检验（p=0.630；p=0.162；p=0.097），说明原生家庭收入对学历的影响、父辈学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工作更换次数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按照显著性水平从大到小依次剔除这三条通径。P_{31} 和 P_{32} 虽然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由于 P_{y3} 被剔除，导致这两条通径的影响无法传递到 y，因此也被剔除。之后，本文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其卡方值为 8.891，df=4，p=0.064。由于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不能拒绝修正模型与初始模型间具有相同性的原假设，因此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修正后的通径模型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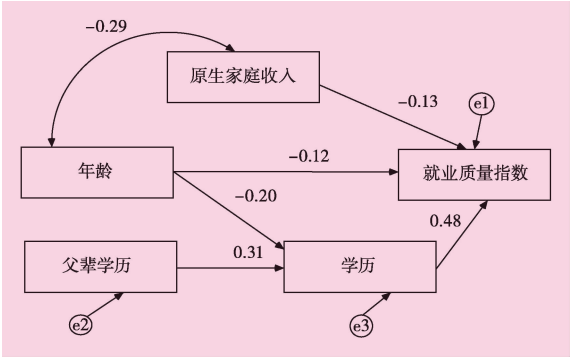

图 5 修正后的通径模型

（二）基于通径模型的分析

1. 个体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通过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学历与就业质量间的直接通径系数接近 0.5，说明学历和就业质量间呈现较明显的正相关，学历越高的调查对象，其就业质量越好。同

时，与模型中其他通径系数的绝对值相比，学历和就业质量间的通径系数绝对值最大，说明学历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最明显。

年龄与就业质量间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12，说明二者呈负相关。年龄与学历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20，说明年龄越大的调查对象学历越低。无论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均表明，年龄越大的调查对象就业质量越低。

工作更换次数和就业质量间的直接通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工作更换次数的变化不会造成调查对象就业质量的明显变化。因此，对于工作贫困者而言，频繁更换工作不会带来就业质量的提升。

个体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说明，具有较高学历、年龄较小的劳动者虽然存在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但具备较好的文化基础，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强于学历较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他们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工作贫困群体中的青年群体由于文化程度略高，平均年龄较小，如果增加相应的技术培训，适当提升其业务能力，他们很有希望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甚至摆脱工作贫困状态。相比之下，年龄偏大的工作贫困群体在文化程度和身体素质上均处于劣势。对于他们而言，维持在当前生活水平已令其捉襟见肘，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困难重重。

2. 原生家庭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修正模型表明，父辈学历通过影响调查对象的学历，对其就业质量产生了幅度较小的间接影响（$P_{14}P_{y1}$=0.15）。但是，父辈学历与就业质量间的直接通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二者无因果关系。原生家庭收入对就业质量产生了很小的直接影响（P_{y5}=–0.13）。说明原生家庭收入较低的调查对象，就业质量反而相对较高。结合前期的探索性研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原生家庭收入越低，越无法给调查对象提供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他们只能依靠自身努力进行拼搏，因此就业质量往往反而相对较好。

很多研究均证实，原生家庭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学历和收入对大学毕业生成就性水平的影响极大（尹海洁、高云红，2014）。而本研究结论与此并不相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读。一方面，就业质量指数的分布显示，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内部分化较小，这说明该群体的就业质量同质性较强，原生家庭即使对就业质量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会在数字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大部分工作贫困者的原生家庭为贫困家庭或生活困难家庭，其父辈学历以小学为主。在访谈期间，我们还发现很多调查对象的父母存在医疗和养老保险缺失、劳动能力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大部分工作贫困者的原生家庭不能对其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任何帮助，甚至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综上所述，原生家庭因素对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是发生在工作贫困群体中的特殊现象，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群体。

总的来看，通径模型中个体因素中两个变量与就业质量间的通径系数明显大于原生家庭因素中两个变量与就业质量间的通径系数。因此，在工作贫困群体中，个体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明显大于原生家庭的作用。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目前东北地区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存在多维度弱势、整体性低下的特点，整个群体存在劳动保障缺失、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岗位发展空间小等问题。由于就业质量的低下，他们很难通过就业实现生活水平的改善，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处于忙碌但贫穷的生活状态中。但是，工作贫困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就业”和“脱贫”的对等性，只是进一步说明，对抑制贫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就业质量，而非就业状态。

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个体因素对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其中，学历和年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最显著，因此，青年工作贫困群体更有希望脱贫。原生家庭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十分微弱，该现象是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低下和父辈经济生活能力低下共同导致的。该结果说明，工作贫困群体已经失去了原生家庭的助力，只能依靠个人努力来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分析结果也显示，工作贫困者的学历相对较低，缺乏岗位技术和业务培训，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较差。因此，工作贫困群体需要一定的政策保护或社会救助才能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

另外，工作贫困群体已经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首先，工作贫困群体父辈的学历和家庭月收入均较低，说明其原生家庭已出现代际固化。其次，工作贫困群体很难通过职位晋升等常规方式来实现纵向流动。通径模型也证实，工作更换次数对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说明职业的横向流动也无法改变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他们已经出现岗位固化。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阶层固化，特别是下层群体的固化意味着社会中不平等结构的复制，弱化了个人努力对阶层自下而上流动的推动作用，限制了社会的活力与发展。

（二）政策建议

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劳动保障因子解释了全部方差的 38.07%，其解释力度是工作环境因子的 3 倍，是岗位发展因子的 4.5 倍，是月收入因子的 4.7 倍，说明该因子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提高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首先应从劳动保障入手。

在具体实施方面，由于工作贫困群体中缺乏劳动合同保护的人员比例较大，所以有关部门应努力健全劳动合同制度，监察部门应对未与工作贫困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进行处罚。另外，要提高工作贫困群体对劳动合同重要性的认识。特别针对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个体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要积极宣传劳动合同的作用，提高他们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合理权益的意识。

研究还发现，大部分工作贫困者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为提升其社会保障水平，建议政府从税收中提出一定比例，作为工作贫困者的社会保险补贴，以鼓励他们自强自救的工作积极性。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一方面鼓励用工单位加大对工作贫困群体社会保险的投入；另一方面要监督这些单位为工作贫困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防止其出现规避

社会保险责任的行为。如果财政条件允许，有关部门可以针对工作贫困群体，特别是年龄较大者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和享受标准，尽量使缴费标准符合该群体的收入水平。

通径模型表明，学历和职业技能是劳动者就业能力的体现，是提升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工作贫困群体的就业能力也是提升其就业质量的有效途径。目前，东北地区虽然没有针对工作贫困群体就业问题的政策，但在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方面已具有导向性政策和应对经验。工作贫困群体和下岗再就业群体虽然在就业状态上有所区别，但都存在知识结构陈旧、文化层次偏低、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可以适当扩大再就业培训规模和对象，尽量将工作贫困群体也纳入培训体系中，增强其知识储备和业务能力，提高专业技能，使他们更具就业竞争力，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用人要求。

参考文献：

1. 郭思齐(2012)：《东北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特点及增收对策》，《长春市委党校学报》，第 3 期。
2. 芦恒(2012)：《“工作贫困”及其社会风险探析——以韩国青年贫困现象为例》，《青年研究》，第 3 期。
3. 黄继忠、朱岩(2012)：《基于基准分析法的东北地区第三产业主导产业选择实证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4. 黄苏萍等(2009)：《我国东北地区非正规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软科学》，增刊。
5. 华迎放(2009)：《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经济学》，第 1 期。
6. 孟凡强、吴江(2013)：《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 5 期。
7. 姚建平(2009)：《中国城镇工作贫困者：概念、成因及对策》，《理论与现代化》，第 5 期。
8. 姚建平(2011)：《中国城市工作贫困者：问题的形成、群体特征与积极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研究》，第 1 期。
9. 尹海洁、高云红(2014)：《神经网络分析与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的比较——基于大学毕业生的成就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 6 期。
10. 张再生、赵丽华(2011)：《国内外关于就业稳定性研究评述》，《理论与现代化》，第 6 期。
11. 周娟(2009)：《关于工作贫穷研究的述评与展望》，《社会保障研究》，第 3 期。
12. Bardone, L., Guio, A.C.(2005), In-Work Poverty: New Commonly Agreed Indicators at the EU Level. *Statistics in Focus*. 5.
13. Diamond, J.B., Gomez, K.(2004), African American Parents' Educational Orient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lass and Parents' Perceptions of Schools.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36(4): 383-427.
14. Fields, G.S.(2012), *Working Hard, Working Poor: A Global Jour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Joassart-Marcelli, P.(2005), Working Povert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owards an Operational Measu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4(1): 20-43.
16. 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1978), The Working Poo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1-4): 345-364.
17.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4),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2012. *BLS Reports*. 1047.
18. Wicks-Lim J.(2012), The Working Poor: A Booming Demographic. *New Labor Forum*. 21(3): 17-25.

(责任编辑：朱　萍)